

# 华人移民与环境适应

## ——探讨马来西亚客家人的经济适应与变迁

Adapt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to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with Reference to the Hakkas in Malaysia

文平强  
(VOON Phin Keong)

### 摘要

这篇论文将探讨华人移民,尤其是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经济环境的适应。不同的华人方言群迁移到一个地方后,往往会偏向从事在祖居地相似的经济行业。早期客家人多数从事锡矿业。这篇论文主要从三方面来进行探讨:首先检验移民与其落脚的“目的地”;接着讨论方言群与经济偏向;最后探讨的是进入二十世纪后,客家族群的分布及对经济环境改变的适应。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anner in which Chinese immigrants adapt to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with reference to the Hakkas in Malaysia. Different Chinese dialect communities tend to migrate to places which were perceived to bear some economic resemblance to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s. The early Hakkas were likely to migrate to areas where mining was a major activity. The paper will focus on three major aspects. The first will examine the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tination" areas. This is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the economic preferences of dialect communities as a reflection of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and the centripetal tendency of dialect

concentrations in specific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final aspect deals with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Hakkas and their response to changing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一、前言

华人方言群的移民过程及其早期到达的地点和经济倾向都反映出其祖居地的情形及地理环境的影响。其实，迁移到一个陌生地方的人们都会偏向于从事自己所熟悉的工作。生活与工作经验已成为他们亲身经历所获得的“知识”，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对陌生地方产生某种“感知”(perception)。这种“感知”将影响他们对某个地方或生活条件所做出的“决定”或“判断”。根据他们的“感知”，移民对新的环境做出适应性的选择，各自企图寻找最“理想”的经济机会，而影响他们的“抉择”的最大“决定性”因素在于“目的地”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等方面。移民群所选择的目的地和他们的经济倾向都会与家乡的经济背景及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这些早期的选择与倾向，可能导致了不同方言群的不同经济参与和遭遇。

东南亚华人是由不同的方言群所组成。从人数上言，最大的移民群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此二省之中，要数闽南移民为最众。接着是广府人、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及福州人。此二省之外，“外省人”则以广西人较多，湖北及其他省份的人数较少。各方言移民群在海外有其特殊的分布，也导致不同的经济活动及环境适应情况。在东南亚各国中，新加坡、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之闽南人与潮州人人口最多，客家人属于少数。与东南亚各国相比之下，马来西亚客家人所占的华人人口比例是最大的。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由几个大方言群所组成，主要方言群依人数多寡顺序为闽南人、广府人、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福州人、广西人及其他几个人数很少的方言群。马来西亚与其他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不同之处是其方言群结构均衡，即有多种方言群体共处，而没有一个压倒性的方言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0 年的人口调查，华人人口为 569 万。从未曾出版的数据作分析，闽南人占 37.6%，广府人及客家人各占 20%，成为三大

方言群。接着是潮州方言群，占 9.3%、福州人占 4.7%、海南人占 2.3%、广西人 1%（见文平强 2007）。从马来西亚的华人方言群的结构，可以看出早期移民对选择移入马来西亚各地时有各别的偏向。

本文将探讨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的“环境”适应情况，所探讨的三个议题是：一、移民所选择迁入的“目的地”，二、方言群与经济偏向及三、客家人对环境适应的变迁。

## 二、移民与“目的地”

马来西亚的华人是一个多元方言群体所组成的社会。殖民统治者很早就确认了华人的重要性。1794 年，槟榔屿政府已经认为华人是“最有价值”的移民（Mills 1925: 53）。华人的刻苦耐劳精神，再加上土著缺乏从事固定工作的传统和必要，使到华人在参与开发的过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华人有创业精神，不断寻找和开拓新的事业，并成为殖民地政府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

纵观移民过程的各种原因，最重要的推动力来自于经济因素。至于对所迁入地点的选择，往往是受其经济吸引力所影响。迁移到马来西亚的华人是以不同方式入境的。大部分移民是因为贫穷而离乡背井，以谋求更好的经济条件。所以，早期的移民普遍上以“卖猪仔”方式出卖劳力（indentured labour）来换取一个希望，也有以自己的能力或亲戚和乡团的帮助或官方的安排迁入，而一小部分则是逃避满清政府压迫的政治性移民。

在这批移民迁入马来西亚或东南亚其他地区的过程中，一个特征是不同的方言群对不同的地理环境各自有所偏向。商机蓬勃的港口和资源丰富的地区被视为最有经济潜力的地带，于是海港及其附近的“腹地”和拥有矿物资源的地区便成为移民眼中最具有吸引力的迁入“目的地”。

某个方言群移民选择的“目的地”和其在中国的地理环境往往有密切的关系。对于住在中国沿海地带的居民，大部分偏向往海港和沿海地带迁移。相反的，居住在远离海岸地带的人，则倾向于进入比较内陆的地区。

若对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人、以汕头为中心的潮州人与居住在内陆和山区的客家人进行比较，的确可看到各别对沿海及内陆地区的偏向。明显的，福建与潮州人的移民目的地一般以海港及沿海地区为主，并多从事商业、贸易及其相关的经济活动。反观客家人则偏向较内陆的农业和矿业地带，因此其人口分布的局限性也比较明显。

从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马来亚半岛锡矿业的开发促使大量的客家人移入。直到二战前为止，橡胶业的崛起及其他行业的出现，使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华人移民大量增加。1901 年至 2000 年客家人与华人在半岛及马来西亚的人口如下（表 1）。

表 1：1911-2000 年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口（'000）

	1901*	1911*	1921+	1931	1947	1957	1991**	2000**
客家人口	83.9	143.6	218.1	298.0	397.4	508.8	1081.4	1092.8
华人总人口	301.5	433.2	1174.8	1284.1	1884.5	2333.8	4609.0	5304.8
百分比	27.8	33.1	18.6	23.2	21.1	28.8	23.5	20.6

\* 指马来联邦 (Federated Malay States) + 英属马来亚 (包括新加坡)

\*\* 包括沙巴和砂拉越

资料来源：Pountney 1911; Fell 1960; Vlieland 1932;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0

20 世纪初至今，客家人是马来西亚华人三大方言群之一，排在福建（闽南）人和广东人之后。2000 年的客家人口总数接近 110 万，占华人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八成的客家人都集中在首都吉隆坡和雪兰莪州（30 万）、砂拉越州（16 万）、沙巴州（15 万）、柔佛州（14 万）与霹靂州（13 万），人数总共达到 88.5 万人（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0）。在各州的华人人口中，客家人在沙巴州的比重最高，达到 58%，接着是砂拉越州（32%）和森美兰州（30%）（见文平强 2007a）。

### 三、方言与经济偏向

海外华人方言群与不同经济领域的联系是由于移民祖居地的历史、乡

情与环境等各种因素所引起的。一般上，客家人的经济源流，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这种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在客家人的祖居地获得较完善的发展。福建帮善于从事贸易买卖，及与其密切关联的金融行业；广东帮以银业为主，以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如餐馆、酒楼、戏院等；在泰国为主流群体的潮州帮则从事米业、新鲜食品、杂货买卖及贸易。客家人有很多知识分子，担任教师、政治家、律师、医生、中医等。客家人在工商领域与福建和潮州人相比，是很逊色的（见梁纯菁 2003: 6-10）。在早期的马来半岛，这个现象在檳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非常明显。福建帮在新加坡等港口商业上的主导地位，极可能是因为大部分的移民是来自福建的泉州、漳州等港口及沿海地区。在中国与东南亚贸易，这些海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Yen 1986: 119）。

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学术界有多种解释，其中包括地理环境、移民过程的连续性、工作专业的长久性、血缘与地缘组织的影响，甚至“秘密组织”的关系等因素（Yen 1986: 118-119）。这里略谈几个原因。

### （一）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

客家人在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各地是矿业开发的先驱。从事矿业与客家祖居环境、资源与历史有连带关系。位于粤闽赣边界线地区的客家祖居地，不仅是远离海岸的山区，也拥有相当藏量及多样的矿产，客家地区的矿产包括煤矿、铁矿、锡矿、铅矿、钨矿、钼矿、锰矿及锑矿。<sup>1</sup> 世代以务农为主的客家人，也拥有丰富的采矿经验。

从 18 世纪末期开始，罗芳伯便领导嘉应客家人组织“公司”制度，在西婆罗洲垦荒与开采金矿（T'ien 1997: 157-167；许云樵 1976: 277）。随着荷兰统治者对西婆罗洲采取军事行动后，一些客家人就搬离并移入砂拉越州从事矿业及农业生产。在马来半岛吉兰丹州布赖地区的客家人可能是在 18 世纪末或 19 世纪初前往该地淘金，他们也很可能是最早迁入马来半岛的客家人（见 Middlebrook 1933）。

马来半岛的著名锡矿产地是雪兰莪与霹雳两州。在雪兰莪州，锡矿的开采始于 1840 年代，几年后拓展到巴生河（Klang River）上游，即目前

首都吉隆坡附近一带。矿工大部分为客家的嘉应和惠州人。在锡矿开采地，一般会出现聚落而逐渐发展成为小商埠。吉隆坡的建设和崛起，并在1896年成为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的首府，惠州人领袖叶亚来的贡献最为突出（见 Middlebrook 1951）。

霹雳州位于马来半岛的中北部，有非常丰富的锡藏量。在1840年代锡被发现之后，华人大量涌入霹雳州，1862年人数达到2万以上，并且在10年内增加到3至4万人（Wong 1965: 27）。采矿的华人帮派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增城客家为主的“海山党”，开埠人为华人领袖郑景贵；另外一派是惠州人的“义兴党”为主（一说广府人）（参见 Khoo 1972；马来西亚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 2003: 13）。

1870年代，在近打（Kinta）地区发现世界上最丰富的锡储藏量。1874年之后，霹雳州这个锡矿地带变成了华人寻找财富之地。华人劳工的人数大幅度地增长。矿区华人人口为26,000人，马来族人口只有7,000人。1889年，这里的锡矿生产超越了其他地区成为最大的锡矿开采区。1895年，近打区的产量为319,232担，占霹雳州总产量的80%（Wong 1965: 90）。

除了这两个州以外，华人也在其他地方开发矿业。不管情况多艰难，只要有致富的机会，华人就不会忽略。在森美兰州的日落务（Jelebu），锡矿的开采吸引了大批华人。在此地，以惠州客家人萧官姐为首的矿家在1890年代帮助大批客家同乡移入（Siaw 1983: 22）。

锡矿业成为马来半岛内地开发的“催化剂”，并成为马来亚最早的经济支柱。1905年之前，马来亚出产世界半数的锡米。1898-1908年间，马来联邦35-41%的收入来自锡矿业（Li 1982: 64）。客家人及其他华人方言群对马来半岛经济的初步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基本建设（如铁路、公路、港口）和市集的建立开始形成并逐渐扩大。拥有丰富矿藏量的近打河流域和巴生河流域促成怡保（Ipoh）和吉隆坡的快速成长。锡矿业也使怡保快速地发展成为马来联邦（霹雳州、雪兰莪州、森美兰州及彭亨州）的第二大城市（Swettenham 1893: 39）。在其他的锡矿开采区，一系列以华人为主的小市镇也如雨后春笋般冒起。

无疑的，客家人与马来半岛锡矿业的开发有紧密的关系。1901年，在当时马来联邦的30万华人人口中，一半是从事锡矿生产及其相关工作。1911年，该地华人人口增加到43万人（36万为男性与7万为女性），其中42%的男性以开采锡矿或有关活动为主要工作（Pountney 1911: 64）。同年，在锡矿生产中心的怡保和吉隆坡，客家人口为96,000人，占华人总人口的43%。在1931年，客家人最集中的地区是霹靂州锡矿业中心的近打行政区，有62,900客家人，占该区华人人口37%。第二主要锡矿出产地区吉隆坡也有44,900客家人，占当地华人人口的35.5%。其他客家人占相当大比例的地区包括森美兰州的芙蓉区（38.7%）和日落务区、彭亨州的劳勿（48%）及雪兰莪州的乌鲁令岳区（61.5%）（Vlieland 1932: 187-189）。早期芙蓉区的锡矿业曾经吸引大批客家人到此地。劳勿区拥有马来半岛最大的金矿开采地。其他两个区是主要农业地区。相反的，海边地带则是福建和潮州人的天下。1931年，在新加坡42万华人人口里，客家人只占4.7%。同样的，客家人只占檳城市区总华人人口的4.2%，马六甲市区华人人口的14.9%，和柔佛州华人人口的15.6%（Vlieland 1932: 187-189）。

就因为历史的因素，在2000年，客家人主要集中在早期的锡矿区（吉隆坡及附近），近打区（怡保），芙蓉区（Seremban）和几个较大的城市如新山（Johor Baru）、古晋（Kuching）、亚庇（Kota Kinabalu）和山打根（Sandakan）。居住在这9个区和市的客家人共达64万人，占总数的59%。其余的客家人分布在小市镇和农业地区。

早期移入马来亚半岛、砂拉越州或沙巴州的第一代客家人，很多都以务农为生。橡胶种植业的兴起更吸引了大批的客家移民蜂拥迁入。在祖居地以农耕生活为主的客家人，移入马来半岛及婆罗洲后，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橡胶业也变成了客家人以及其他方言群体普遍从事的行业。

马来亚橡胶业的领航者是福建人。19世纪末，林文庆以及陈齐贤分别在新加坡和马六甲大胆开拓橡胶种植领域（吴体仁 1966: 39-72）。接着也是以福建籍的陈嘉庚及李光前为首的企业家大量开发橡胶业，成功地使华人种植企业取得一定的成就。

橡胶业很快地成为马来半岛的第二大经济支柱，并在1916年替代了

锡矿业成为最大的经济领域 (Lim 1967: 325)。1922 年, 亚裔园主拥有的橡胶小园丘面积达 91 万英亩, 1953 年为 137 万英亩, 其中华人拥有 55 万英亩或 40% (Lim 1967: 332)。

橡胶业的崛起是由各阶层的投资者与普通阶层促成的一种自发性的发展成就。其发展初期主要是由西方资本和企业主导, 并以先行一步成功地在西海岸各州占据了大片的地段。亚裔橡胶业者, 因为起步迟而且缺乏资金, 所以一般上只能占用较偏僻的土地。橡胶业进入蓬勃发展期之时, 客家人与其他人一样, 积极地参与种植业, 成为橡胶小园主。华裔农民通常居住在各别的园丘里, 从而使更多华人向乡区扩散 (见 Khoo and Voon 1981: 52-67)。

1910 年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 1920 年代的经济不景气时期, 粮食短缺, 很多失业的工人开始种植稻米、蔬菜、薯类食物和饲养鸡、鸭、猪或鱼来维持生计。因为缺乏资金和土地, 农民只能占用政府或他人的土地或森林地段。非法占用土地的种植方式扩大了在乡区的种植面积, 并分布在锡米和橡胶的生产地带。1921 年, 在霹雳州, 估计有 13,000 户菜农, 人数至少有 2 万到 3 万人 (Loh 1988: 21-26)。二战后, 殖民地政府视他们为非法占用土地者 (squatters)。

在砂拉越州第一省的橡胶业工人和小园主大部分为客家人, 其中一小部分以有限的储蓄在小市镇经营小买卖, 较大的店铺都操纵在福建和潮州人手里。即使在中国的客家祖地, 客家人从事农业, 而潮州人则做大买卖 (Tien 1997: 58)。在沙巴州, 客家人也几乎清一色是农民和劳工 (张德来 2002: 321)。

## (二) 向心倾向

在中国, 大部分人民长期生活在固定的省或县里。由于受到空间隔离和人与人之间少接触, 而产生了语言沟通的障碍。当多种不同籍贯和方言群体或某个方言的分支进入马来半岛时, 自然产生了陌生感甚至一些“文化惊异” (culture shock)。

各方言群体由于少接触或互不相识, 因此彼此之间绝少互动了解, 甚

至导致偏见、歧视或排斥。在中国的两广、福建、江西、台湾等地曾经发生所谓“土客争斗”的资源争夺事件（刘佐泉 2003: 159-188）。在东南亚各地，当地人或殖民统治者和华人的纷争以及对华人的压迫甚至屠杀是历史事实。然而华人之间也时常爆发争夺资源或地盘的经济纷争。

早期华人移民是以乡情（籍贯、方言、地缘等）为其“向心”基础。不同的方言群体控制了某种经济领域而形成一种强势的“向心”倾向，藉以扩展本身的“网络”和人际关系，把更多同乡吸引到相同的领域。在地方性的开发过程当中，有许多类似的“向心”倾向的例子。

移民是为了追求温饱和提升经济地位的一种竞争。早期华人移民经常遭遇到方言群之间的竞争与打斗，或者遭受本土人的威胁。所以 19 世纪的华人社会曾经出现过严重的“离心”倾向，导致发生了相互残杀的黑暗历史。最可能引发残酷冲突的起因在于对资源的争夺，如 1867 年发生的檳城暴动，1867 至 1873 年爆发的雪兰莪“内战”，以及 1861 至 1873 年在霹雳华人帮派中发生的三次“暴乱”（见 Khoo 1972）。这种华人互相残杀的局面，是争夺锡矿资源，加上马来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经济利益冲突所酿成的后果（参见 Middlebrook 1951; Wong 1965; Khoo 1972; Yen 1986）。在其他地区也同样发生类似的小规模事件，比如柔佛州古来惠州客与河婆客之间的对抗（Lees 1964: 287）。

### （三）华人经济结构

早期东南亚华人经济是以港口的小型进出口或转口贸易、城市商业经营、乡村小买卖、农业和矿业生产及劳工为基础。在这个窄小的经济结构里，方言的向心倾向构成了乡情关系与网络。与同乡从事共同的经济活动是促进合作并提升网络关系的最实际途径（见 Redding 1993: 36）。

在马来半岛和砂拉越，橡胶生产和经营买卖与方言群的乡亲关系相当的明显。大部分的橡胶出口商是福建人，而橡胶生产人以客家人为主。在砂拉越，客家人和福州人是橡胶小园主或工人，也有地方性经营橡胶买卖的乡村小生意。但是在市镇里的中等和大收购商几乎都是福建人与潮州人（T'ien 1997: 86）。

福建及潮州商人能够主宰橡胶买卖与出口是因为他们的营业基地设在城市，并拥有资金，而生活在乡区的客家人则缺乏资金和经营的经验。橡胶销售网络的终点是新加坡的大橡胶收购商与出口商。这个行业操纵在福建与潮州商人手里，其他方言群难以介入 (T'ien 1997: 96)。

#### 四、对环境适应的变迁

客家人对环境适应的变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第一是客家人居住地的分布及在就业上的变化。第二是导致变化的原因。

##### (一) 人口分布与职业变迁

马来半岛客家人的人口分布与早期的情况相比有极大的变化。华人人口的分布与居住的空间渐渐缩小，人口日益集中并呈现城市化的现象。

二战前至 2000 年，马来半岛客家人的分布状况的变化是对环境适应的一部分。雪兰莪州与首都吉隆坡已成为客家人最集中的地区，是马来半岛将近四成的客家人的居住地。相反的，曾经主宰锡矿业的霹雳州，从一个拥有最多客家人口的州属掉到第三位。除了雪兰莪州与首都吉隆坡，另外一个客家人“崛起”的州属是位于半岛南端的柔佛州。其余的州属，客家人口的比重都下降了 (表 2)。

表 2: 1931 年与 2000 年西马客家人的人口分布

区域	1931 年	百分比	2000 年	百分比
雪兰莪州与吉隆坡	80,200	26.80	302,924	38.75
霹雳州	87,900	29.40	133,767	17.11
北部 (檳城州 / 吉打州 / 玻璃市州)	33,200	11.10	67,335	8.61
中南部 (森美兰州 / 马六甲州)	45,000	15.05	94,788	12.13
南部 (柔佛州)	33,600	11.24	139,577	17.86
东海岸 (彭亨州 / 吉兰丹州 / 登嘉楼州)	18,100	6.05	43,320	5.54
总数	299,000	100.00	781,711	100.00

资料来源: Vlieland 1932;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0

人口分布的变迁是对经济环境适应的过程。客家人居住地的变迁主要反映了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对华人包括客家人的人口分布有长远的影响。

二战后，反殖民主义斗争促使英国殖民统治者强迫乡区华人迁移到中型的“新村”。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短短4-5年间，总计50万华人被强迫搬迁到500多个作为“军事”聚落的新村。大部分的新村设置在各个县总部的市镇。<sup>2</sup>

这些被迫迁移的居民，也包括了大部分从事锡矿业及农业的客家人。无形中，新村也快速地提高了客家人口的城市化。人口最多的几个新村都位于吉隆坡的市郊。这次强迫性的人口迁移使到矿业与农业地区成为无人居住的地带，而乡区华人搬迁到新村更缩小了华人人口分布的地理空间。

## (二) 经济上的变迁

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的方言群与经济领域的联系也更松散和模糊了。这种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

一、马来西亚的经济主干，也就是锡矿业与橡胶业，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下滑和没落，并对乡区客家人带来极大的冲击。1985年，国际锡市的危机导致马来西亚锡矿业崩溃。马来西亚的锡总产量从1979年的6万3千吨滑落到1988年的2万9千吨。十年后，锡产量仅是区区的3-4吨而已(无名氏2003)。

橡胶业的没落是经济与社会因素交加导致的后果。1980年代开始，橡胶生产渐渐地失去其经济效益。城市化使新村的年轻人离开乡区到城市去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或者升学。年轻人对枯燥及缺乏前途的家庭式橡胶生产失去信心和兴趣，遂导致许多橡胶园停止生产。

二、从1980年代起，国家工业化策略促使经济转型和快速的城市化。外资的大量流入及工业的蓬勃发展造就了各种就业机会。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从依靠橡胶与锡米出产变为工业加工经济。新村与其他乡区也成为了供应工业劳动力的来源。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又因为乡区缺乏就业机会，乡区人口的流失量越来越大。当然，方言群与某些行业的传统关系

还是留有一些痕迹。至今，捕鱼业还是福建及潮州人的“专业”。直至2000年，九成与捕鱼业有关系的华人来自这两个方言群（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0）。

在客家人对经济环境的适应过程中，与人口分布变化分不开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客家人在职业上的变化。表3的数字显示，客家人目前的就业情况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是失去了从事传统事业的倾向。第二是迈进新的工作领域。

明显的，马来西亚客家人的就业情况已脱离了矿业和农业为主的传统现象。根据2000年的统计，只有5.7%的客家籍就业人口是从事农业生产或相关的职业，也只有4.8%的客家就业人数涉及矿业与建筑业。

客家人在非传统的工作领域扮演逐渐重要的角色。2000年，客家就业人口大部分集中在三大领域：第一是“高级行政与管理人员”、“专业人士”及“教育与相关职业”，共吸引了将近两成的客家就业人数。如果将“技术人员”包括在内，其比率将上升至27.4%，成为客家人最大的就业领域。吸引客家人的另外一个领域是从事“文书及相关服务”以及“服务与

表3：2000年马来西亚客家人职业分布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高级行政与管理人员	49,507	11.30
专业人士	19,812	4.52
教育与相关职业	13,127	3.00
技术人员	37,608	8.58
文书与相关服务	46,279	10.56
服务与销售业	70,342	16.16
农业与相关职业	25,163	5.74
捕鱼业	1,152	0.26
矿业与建筑业工人	21,148	4.83
工业工人	42,424	9.68
劳工	59,119	13.49
总数	438,206	100.00

资料来源：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0

销售业”，共有 26.7% 的就业人口来自这两类工作领域。第三个比较主要的就业领域是“工业工人”及“劳工”，一共占了 23.2% 的就业人数。

以上三大种类的就业领域是以教育层次为分界线。每五个就业的客家人就有一个是高级行政与管理人员、专业人士或教员以及相关的职业。这点是值得注意的。这个领域，尤其是高级行政与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士都需要高等教育资格，而教员也需要达到一定的教育水平。第二个就业领域，在教育层次上需要中等教育资格，但毕竟是属于受薪阶级而已。第三个领域是对教育要求不高的职位，成为许多离开乡区的居民的就业选择。

三、教育：第一代的客家人移民，由于没有选择职业的条件，大部分成为劳工、农民或投入其他地位低微和低收入的经济领域。唯有通过教育的途径才能够突破现状，寻找更好的发展方向。

不论是居住在市区或乡区的方言群体，它们的后代都试图不断地寻找更好的前途。早期居住在市区的华人，形成了“华人市区”，而居住在乡区的华人，集中在简陋的木屋区里。<sup>3</sup> 不管是在市区或者是木屋区，都代表着初期华人移民的“落脚地”，是寻求生存的第一步，并且集中在个别方言群的经济专业领域里。他们的后代，一部分慢慢地“冲出”这个缺乏移动性的圈子，向更专业性的经济领域进军。自然的，方言群体与传统职业的联系就渐渐地淡化与模糊了。

每个方言群皆有其所谓传统的经济领域，这其实是时势和处境所造成的。即使有选择的自由，大部分的华人子弟都宁愿离开传统的家庭式小生意或父辈的劳动性职业，成为公务人员或专业人士。而唯一能够实现这种转型的途径是教育。华人社会之所以非常重视教育，就是要使下一代拥有更好的“出路”和前途，以实现许多穷困家庭“翻身”的希望。

在殖民地社会，教育不仅是指中高等华文教育，更重要的是指殖民地统治者媒介语的教育。在沙巴，因为客家人在当地华人中的人口最多，并且大部分与基督教会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接受英文教育的情况相当普遍。1962 年（独立前一年），沙巴州公共服务（不包括低阶职工）的 616 位官员里，华人有 195 位，占总数的百分之 31.7，仅次于欧洲人（张德来 2002: 330）。

教育是迈向专业领域的最佳途径，然而中高等教育机构多集中在大城市与国外。为了升学而离开家庭的年轻人，是走出“华人市区”或乡区传统工作的领路人。毕业后的工作专业是根据个人的选择，很少受到与方言有关的因素之影响。

## 五、结论

自从移入马来西亚后，客家人对国家的矿业与农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随着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变迁，客家人也自发的，或被迫的，对不同的环境做出相对的适应。经过了在马来西亚逾百年的长久定居以后，客家人无论在人口的分布或是经济领域的工作选择上，都经历了明显的适应与变化。

在环境适应过程中，移民文化“遭遇”了在语言、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民族感情各方面的本土化趋势，显见华人方言群之间的差别逐渐地淡去。在语言上，一项促使华人融合的趋势是华文教育及华语（普通话）应用的普遍性，使“华人”的认同趋势盖过“乡土”的区别。

在教育的提升及其他“向心”趋势的影响下，方言群与经济领域的联系逐渐模糊。追求和确保自身利益，不再是个别方言群对地理环境做出调整适应以谋求更佳经济条件的原因。更为关键的是，各方言群以华人的身份更能适应政治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并巩固与扩大其贡献。这必然会使华人在国家中的地位获得认同与肯定，也能确保华人的长远将来。

## 注释

- 1 客家地区的矿产多样及丰富，计有煤矿，铁矿，锡矿，铅矿，钨矿，钼矿，钒矿，锰矿及铋矿。见罗香林，1976。
- 2 殖民政府与二战后的反抗殖民势力斗争，并以实行“紧急法令”（1948-60年）条例控制被视为反政府分子。“紧急法令”初期全部乡区华人被逼搬迁到“新村”居住。以便促使监督新村人民，殖民政府将大部分的新村位置于市镇边缘，并且把居民与在郊外地区活动的抗殖民分子隔离。

- 3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与其他海外华人其中一个不同的地方是新马两地在概念上没有“唐人街”(Chinatown),只有“华人市区”(Chinese town)。有关“唐人街”的概念,见文平强,2007b。

## 参考书目

- 梁纯菁 2003。〈客家文化与创业精神:客家华人的企业契机〉,《客家、族群、多元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苗栗,12月13-14日,页6-10。
- 罗香林 1976。〈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载《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银禧纪念特刊》,吉隆坡: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银禧纪念特刊出版委员会,页241-242。
- 刘佐泉 2003。《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页159-188(1991年初版)。
- 马来西亚华人矿务总会编 2003。《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怡保:马来西亚华人矿务总会。
- 文平强 2007a。〈马来西亚华裔方言群人口与分布〉,《华社研究中心通讯》,第一期:27-35。
- 2007b。〈唐人街〉《华社研究中心通讯》,第一期:35-37。
- 无名氏 2003。The tin crisis,载《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怡保:马来西亚华人矿务总会,页119-146(Anon. The tin crisis.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Chinese Tin Mining Industry in Malaysia*, Ipoh: Malaysian Chinese Mining Association: 119-146)。
- 吴体仁 1966。《殖产橡胶拓荒人》,新加坡:世界书局。
- 许云樵 1976。〈嘉应研究管窥〉,载《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银禧纪念特刊》,吉隆坡: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银禧纪念特刊出版委员会。
- 张德来 2002。《沙巴的客家人——客家华人贡献沙巴州现代化之探讨》,哥打京拿巴鲁:沙巴圣学院。
-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00. *Chinese Dialect Group by Occupation* (unpublished data), Putrajaya.
- FELL, H. 1960. *1957 Population Census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Report No. 14*, Kuala Lumpur: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 KHOO Kay Kim 1972. *The Western Malay States 1850-1873*,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HOO Soo Hock and VOON Phin Keong 1981. Origi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settlement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In *Man, Culture and Settlements*, edited by R. Eidt, Kashi N. Singh and Rana P. B. Singh, Varanasi: 52-67.

- LEES, F. 1964. Chinese settlement in the Kulai Sub-district of Johore, Malaysia. In R. W. Steel and R. M. Prothero (eds), *Geographers and the Tropics: Liverpool Essays*, London: 277-296.
- LI Dun Jen 1982. *British Malaya: An Economic Analysis*, Kuala Lumpur: Institut Analisa Sosial, 1982 (first published in 1955).
- LIM Chong Yah 1967.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H Kok Wah 1988. *Beyond the Tin Mines: Coolies, Squatters and New Villages in the Kinta Valley, Malaysia, c. 1880-1980*,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DDLEBROOK, S. M. 1933. Pulai: an early Chinese settlement,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1, Part 2: 151-156 (reprinted in *A Centenary Volume, 1877-1977*, MBRAS Reprints, 1977, No. 14: 81-86).
- 1951. Yap Ah Loy (1837-1885),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4, Part 2, MBRAS Reprint No. 9.
- MILLS, L. A. 1925. British Malaya, 1824-1867,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III, 1925.
- POUNTNEY, A. M. 1911. *The Census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11*. London: Darling & Son.
- REDDING, S. Gordon 1993.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SIAW, Laurence K. L. 1983. *Chinese Society in Rural Malaysia: A Lo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iti, Jelebu*,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WETTENHAM, Frank A. 1983. *About Perak*,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 T'EN Ju-K'ang 1997. *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Kuching: Research & Resource Centre Committee SUPP Headquarters (first published in 1953,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onograph on Social Anthropology No. 12).
- VLIELAND, C. A. 1932. *British Malaya: A Report on the 1931 Census and on Certain Problems of Vital Statistics*, London: Walter Low.
- WONG Lin Ken 1965.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YEN Ching-hwang 1986.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